

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

〔美〕李中清 郭松义 主编



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

〔美〕李中清 郭松义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新登字(京)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美)李中清主编,郭松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0

ISBN 7-301-02593-9

I. 清… I. ①李… ②郭… III. ①历史-中国-清代-研究-文集②人口社会学-中国-清代-研究-文集 IV. ①K249-53②C32-05

书 名: 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

著作责任者: [美] 李中清 郭松义

责任编辑: 周月梅

标准书号: ISBN 7-301-02593-9/K·184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 100871

排 印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5.5印张 263千字

1994年9月第一版 199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1—700册

定 价: 29.00元

前 言

李中清 郭松义

在中国,近十多年来,由于人们对现实人口问题的注意,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加到历史人口学讨论的行列中来。

中国历史资料的丰富是世界仅有的。这,当然也包括有关人口方面的记载。但是,因为当时人的着眼点不同,这些人口记录,在今天看来存在着很大的缺憾,有的甚至很难进行使用。就以历代人口统计资料而言,除了登录项目不全以外,在很长时间里,它是和赋税连在一起的,而在税收中,隐漏诡挂乃是经常存在的,以致实际人口数总要远远地多于政府登录数。到了明代后期和清朝前期,户和丁已完全演变成为一个赋税概念,与原来的含义大相径庭了。在数以万计的各类谱牒中,也包含着大量的人口资料。中国的修谱历史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在当时,朝廷选官,士族间婚配,都要考稽谱牒。于是“官有簿状,家有谱系”,成为普遍情况,谱牒之学大盛^①。不过早期的谱牒,均亡佚殆尽。今天能够见到的,都是明代以后的家谱,其中尤以清代为最多。现存的家谱,最主要的内容是谱系。它“一依行辈、时代为序”^②,有的还要注明生卒、配偶、子女等等,这对我们研究人口史无疑是十分宝贵的。其中颇有学者据此作出了很扎实的研究。但是家谱资料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多数家谱只有简单的男性行辈排行,有的即或记载了生卒年月,可常常又忽略了对配偶的记录,或记妻不记妾,更不记无子之妾。至于在子女出生中记男不记女,不记早殇者之类,更是经常之事。这些,都给使用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此之外,中国史籍中还有不少足资利用的人口资料,不过那都比较零散,有的充其量只能作为辅助性史料使用。

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了一批清代皇族人口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玉牒》,亦即皇族宗谱。清代《玉牒》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始修,直至清亡后的1921年(即宣统十三年末),统共修了28次,记录了从太祖努尔哈赤父系开始,到民国初年止的皇族子孙名字,共20余万人。这样延续300来年不间断的人口资料,那是任何一姓一族家谱所没有的。《玉牒》资料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全面。如男性本身宗支、房次、名字、生卒年月日时,封爵、职位,母父姓、外祖姓名任职,妻室嫡

庶,以及任官履历等项;女性则记父名,行次(第几女),生母姓氏,生卒年月日时,外祖姓名、任职,出嫁年月,夫婿姓名、职官、卒年等。此外,有关过继、继承关系等项,也都一一作了载录。清朝当局为编纂《玉牒》,还规定了各种户口登录制度,留下了众多的有关册籍。以上等等,都是研究中国人口史必须而又十分难得的资料。

清代皇室宗谱之所以收存如此完整,记录内容又如此详尽,最主要的当然是因为有皇家的特殊地位。凡其子弟,从出生时起,历婚嫁、直至老死,按着与皇帝关系的亲疏和地位高低,都能享受一定的政治、经济好处。因为有好处,人们便乐意按制呈报,不致于瞒骗隐漏。再就是有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规定呈报的项目,届时必须申详登录,“迟误不报”,或“报不以实”,其“首领”便要“从重治罪”^③。为了落实对皇家族人的管理,还任命了族长、总族长,又专门建立宗人府一级机构。宗人府虽不参与中枢政务,但它位列内阁、军机处之前,是个体隆位崇的法定政府部门。采用如此手段,将政权和族权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掌管族人一应事务,其它任何一个家族都无法做到,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登记内容的正确可信性。

较早注意清代皇室宗谱并用之于人口研究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鞠德源。他在80年代中期起,先后写了《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④和《清代皇族人口呈报制度》^⑤。接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的李中清也着手对清《玉牒》进行研究。由于这项研究得到了国际、国内很多组织的资助,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在提供资料上给予很大的方便,使得整个工程很快地运转起来。先后参加这项工作的有美国的李中清、康文林、马文清、王丰,台北近代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的赖惠敏、刘素芬、蔡淑美、崔小茹、雷逸婷、刘玉萍等。他们曾花费相当气力着手于建立“宗人府档案”电脑资料库,将《玉牒》中的男女本人姓名、出生日期、婚嫁、爵职(女性则记有夫婿爵职)、死亡(女性包括夫婿亡故日期),以及有关父母情况等内容,转换成可用电脑识读的文字、数字及代码,以便随时查询。为保证统计的正确、客观,他们还用《玉牒》以外的档案或史书进行必要的校正,目前已完成了近八万人的资料输入,剩下的工作仍在继续。

就在部分资料整理的基础上,研究工作也踏实地开展起来,几年里做了像“中国历史人口中对婚内生育的控制”、“清室皇族中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清代皇族的过继策略”、“清代皇族婚姻与宗法制度”等课题研究。为了更好地理解《玉牒》资料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加强对清皇族人口史社会背景和环境状况的了解,李中清还约请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鞠德源、胡启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郭松义,中国科学院地理研

究所的张丕远,中医研究院的陈可冀,南开大学的杜家骥等人,参加了有关清代皇族人口册籍,清宗室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以及与皇族人口相关的社会与环境等题目的研究。

1993年1月,诸位学者共聚北京,进行了一次以“清代皇族人口及其环境——人口与社会历史(1600—1920)”为题的学术讨论会,各自就研究的课题作了有意义的探讨。本论文集辑辑的文章,基本上就是此次讨论会提供论文的修改本。只是牵涉到有关气候、疫病,政治及文化变迁对人口行为所造成影响的这部分文章和发言,因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来不及成文,就暂时割爱。

由于清代皇族所处的特殊地位和经济条件,利用《玉牒》资料所作的出生率、死亡率,以及种种有关人口行为的研究,与当时众多的一般家庭的人口行为多少会存在差异。但它毕竟是17—20世纪初的中国人口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别于同时期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历史人口学的研究中,比较起来,欧美等西方国家走在头里,出版了一些带有权威性的著述,所以人们在涉及到人口行为的数理分析时,都是以西方模式为主。尽管很多学者注意到东、西方人口模式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但至今尚无人能将东方模式通过定量研究表述出来。我们看重《玉牒》资料,花费很大精力建立电脑资料库,就是想通过对这份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家谱及其相关环境的研究,为日后搞出一套东方人口系统开个好头,希望能弥补这个至今使人感到遗憾的缺门。

此次编入论文集的文章,就内容来看,大致可分成三种类型。一是主要根据资料库提供的数据分析后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他们有王丰、李中清的“两种不同的节制性限制机制:皇族人口对婚内生育率的控制”,李中清、王丰、康文林的“两种不同的死亡限制机制——皇族人口中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赖忠文:“1840年后清宗室死亡率下降之真伪”,赖惠敏:“清代皇族的过继策略:传承子嗣抑或繁荣家族?”刘素芬:“清代皇族婚姻与宗法制度”。这些都是直接谈皇家宗室人口行为的,构成论文集的主体。属于第二类的文章有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册籍”,郭松义:“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赖惠敏:“清代皇族的封爵与任官研究”,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传、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之影响初探”。这组文章主要为配合第一类文章所作的背景性材料,目的是使读者便于了解《玉牒》等人口册籍的内容、价值,皇族人口行为的社会原因。归入第三类的文章有胡启松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宗室人口史料概述”,蔡淑美、李中清、康文林、马文清:“宗人府档案”电脑库的建立、分析利用及其困难,主要是介绍资料本身和资料库的情况,虽属附录性质,但内容也很重要。在论文集

最后,我们附发一篇由定宜庄整理的本书内容综述。有的读者在翻阅文章之前,想先了解一下大体内容,该文就起这样的作用。李中清的“中国历史人口制度:清代人口行为及其意义”,原是1992年在上海一个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因为它在谈到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清代人口学研究的同时,又涉及到《玉牒》资料的一些例证,并与西方世界作了适当比较,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此次收辑在内,单独列为一组,放在所有论文之首,就是想一开始给读者提供一个较宽的面的轮廓。

通过本论文集的约稿和编集,我们认为作者们的态度是认真的,文章的质量总的说来也是够水平的,但毕竟因时间等种种缘故,有的问题的解释还不完整,也有的方面来不及全面展开,再如第二组背景文章与第一组主题文章扣得不紧凑,等等。特别要提到的是,牵涉自然和文化环境对人口行为关系的文章,竟一篇未能收入。应该说,它是当前人口史研究中十分重要而又相当薄弱的一个方面。

作为本集的主编,对所选入的文章中,花费精力最多的是统一体例,其次是做必要的文字加工,当然也有对某些内容或事实作出改动的。但涉及看法上的问题,只要本之史实,言之有据,我们都不作删削。读者也许会发现,在一些文章中,对同一个问题,看法上常常不尽相同。兼容不同观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课题的研究,除少数人接触年头稍长,相当一些人参加的时间很短,有很多相关的问题尚待摸深摸透,特别是考虑皇族在当时社会上的特殊地位。他们与一般百姓的人口行为,哪些是类似或相同的,哪些则完全不同,需要花时间作某种比较。就资料库而言,现在我们只做了8万人的数据,远未建设完毕,而且在查对《玉牒》和其它相关资料中发现,大体前期的登录比较慎重准确,到了嘉庆、道光后,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皇族人口庞杂,错讹、缺漏日渐增多,及至1921年所修《玉牒》,马虎草率之处就更难枚举了。这些,都需要花费精力去完善,或做必要的校正工作。本来,处理学术问题就是件十分慎重的事,只有通过不断深入钻研,相互讨论,才能认同归一,匆忙作出决断,难免会出差错。我们摆出上述种种问题,主要为了表明尽管开头是好的,基础也是扎实的,但是前面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我们有信心做好它。

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在某种意义上只能说是个阶段性成果。随着资料库的进一步充实丰富,以及对一些相关问题考察的扩展深入,我们将编辑第二本或第三本书,以期将清代皇族人口研究这个课题,不断地推向成熟。

在编辑本论文集过程中,中央民族学院的定宜庄帮助做了很多工作,并参与定稿讨论。美国夏威夷大学与东西方文化技术交流中心的王丰参

加了稿子的初审。此外,南开大学的杜家骥也对某些稿件提出了中肯、有益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 释

- ① 见郑樵:《通志》,《氏族略》。
- ② 见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3,《高邮沈氏家谱叙例》。
- ③ 见乾隆《宗人府则例》卷1。
- ④ 刊于《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版。
- ⑤ 刊于《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

目 录

前言	李中清、郭松义(1)
中国历史人口制度:清代人口行为及其意义	李中清(1)
两种不同的节制性限制机制:皇族人口对婚内 生育率的控制.....	王 丰、李中清(18)
两种不同的死亡限制机制——皇族人口中的 婴儿和儿童死亡率	李中清、王 丰、康文林(39)
清代皇族的过继策略:传承子嗣抑或繁荣家族?	赖惠敏(60)
清代皇族婚姻与宗法制度	刘素芬(90)
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	郭松义(116)
清代皇族的封爵与任官研究.....	赖惠敏(134)
清代天花病之流传、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之影响初探	杜家骥(154)
清代皇族人口册籍.....	鞠德源(170)
“宗人府档案”电脑库的建立、分析利用及其困难	蔡淑美、李中清 康文林、马文清(191)
1840年后清宗室死亡率下降之真伪	赖忠文(20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宗室人口史料概述.....	胡启松(217)
清代皇族人口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书内容综述.....	定宜庄(230)
附录:论文作者单位	(236)

TABLE OF CONTENTS

Introduction	<i>James Lee and Guo Songyi</i> (1)
The Chinese Demographic System; Recent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i>James Lee</i> (1)
Nuptiality and Fertility among the Qing Nobility; Implications for Two Types of Preventive Checks	<i>Wang Feng and James Lee</i> (18)
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among the Qing Nobility; Implications for Two Types of Positive Checks	<i>James Lee, Wang Feng, and Cameron Campbell</i> (39)
Male Adoption Strategies among the Qing Imperial Lineage	<i>Lai Huimin</i> (60)
Nuptiality and Lineage among the Qing Imperial Nobility	<i>Liu Sufen</i> (90)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and Economic Status among the Qing Imperial Lineage	<i>Guo Songyi</i> (116)
Nobility and Office among the Qing Imperial Lineage	<i>Lai Huimin</i> (134)
The Spread and Prevention of Small-Pox by the Qing Imperial Lineage	<i>Du Jiaji</i> (154)
Demographic Records of the Qing Imperial Lineage	<i>Ju Deyuan</i> (170)
Machine Analysis and Data Coding of the Qing Imperial Lineage	<i>Tsay Suemei, James Lee, Christopher Myers, and Cameron Campbell</i> (191)
The Completeness of Death Registration of Imperial Lineage Members after 1840	<i>Lai Zhongwen</i> (205)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 Imperial Lineage Population Data in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i>Hu Qisong</i> (217)
Chinese Lineage Demography;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Ding Yizhuang</i> (230)
Appendix; List of Contributors	(236)

中国历史人口制度：清代人口 行为及其意义^①

李 中 清

从170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爆炸”，由1.75亿增至2000年的13亿，增加七倍之多。图1大致勾勒了这一人口持续增长的过程。人口发展的趋势可约略分为三个阶段：1700年到1800年的直线上升，1800年到1950年的缓慢递增，以及1950年之后的加速成长（Ho 1992年；Schran 1978年），更重要的是，尽管现今政府一直努力推行控制生育的政策，中国人口仍将以较缓慢的速度继续增长，直到下个世纪中叶——到那时人口总数将逾16亿。其后果是，当代中国将严重地受到经济、生态和社会等因素的制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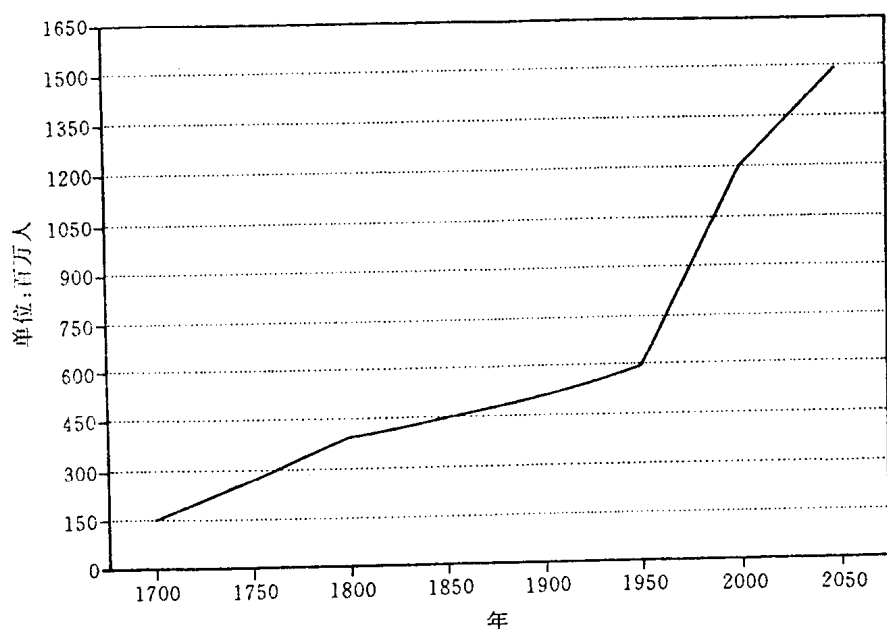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的人口爆炸(1700—2050)

很久以来，西方史学家一直对中国人口“爆炸”的社会和经济意义产生兴趣。而西方对于近代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认识与探讨，则大部分为清代人口增长的事实所限制。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人口的增加，对于扩大

和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Elvin 1973年; Myers 1980年; Perkins 1969年)。一方面,人口密度的增加导致了生产的集约化,及进一步商业化和城市化的趋势(Skinner 1964, 1965, 1977和1985年)。另一方面,人口的持续增长终将引起人均产量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化现象(Chao 1986年; Huang 1985和1990年)。这一过程反映了博瑟拉普的上升论和马尔萨斯的危机论(Lee 1986年)。

然而,将清代人口的微观变化同社会经济的宏观变化联系起来考察,是近期才开始的一种尝试。以往对于清代人口史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制度史(Ge 1991年; Ho 1992年),或借来源不一且自相矛盾的数据,力图估测人口“爆炸”的概况(Perkins 1969年; Schran 1978年; Skinner 1987年)。于是乎人口学家将注意力转向台湾地区,因为那里有唯一大部分对外开放研究的中国人口资料(Barclay 1954年; Barclay 等1976年; Taeuber 1973年; Wolf 1984和1985年; Wolf 和 Huang 1980年)。如果说清代的中国人人口一直是历史上数量最大却为人了解最少的人口,一点也不为过。

然而,这种状况正在被迅速地改变。^②受欧洲人口史研究启发而产生的新的方法及数据,使清代历史人口学研究受益匪浅。其结果是,由1979年以前每年有关人口史方面的论文还不到两篇,增加到每年30篇以上(Lee 1984年)。这些研究大多注重依据已知史料,对人口增长进行宏观的分析。但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依赖于新的微观层次资料,运用新的微观分析法。我将在下文概述这些微观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而讨论其对于我们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认识中国社会和经济行为的意义。

一、研究 成 果

同在欧洲的情形类似,中国历史人口学的重大进展得益于名册,尤其是宗谱及户口注册记录的发现及研究。历史人口学家对于上述两个资料中所记录的20万人口(其约占1600—1900年间中国总人口万分之一),进行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测算。^③由于这些记录大部分描述了有权有势者及侍奉他们的农奴、仆人和佃农的情况,因而他们的出生率及死亡率未必能代表整个中国。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研究中看出,清代的人口行为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

中国的人口系统与西方相较具有显著的差别(Flinn 1981年)。欧洲人口其特征是单身、晚婚、高生育率及自然死亡率。这种“自然”的死亡率,因年龄而异,而且常受到疾病等外因支配。而在中国,女性普遍早婚,生育率水平持中及与其共存的一夫多妻制,和有人为控制的死亡率(在幼龄组

尤其如此,多数来自父母的控制因素)。这些人口制度在欧洲和中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人口行为。中国人口学不仅对社会经济史的了解,对于比较人口系统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欧洲相比,清代中国人口的生育率相当低。据大范围的研究,那一时期20岁成婚,在一夫一妻制下生活的中国妇女,于45岁以前平均仅生育五个孩子(Barclay 等1976年;Liu Ts'ui-jung 1981,1983,1985,和1992年;Telford 1992年及近期将出版);相同处境中的欧洲妇女则平均生育十个孩子(Wilson 1984年)。图2对欧洲国家和中国女性婚后生育率的模式依照年龄进行了比较,^④生育率最大差别出现在妇女的年轻时期。欧洲20来岁已婚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是同年龄组中国妇女所生孩子数量的两倍。即使在将届40岁的欧洲已婚妇女生育数也与20岁出头的中国已婚女子的生育数相同。虽然这些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缩小,但中国40来岁已婚妇女的生育数仍仅是同龄欧洲已婚妇女的三分之二。虽然生育率在年轻育龄组中还是相当低,其他育龄组也仅是中等水平,但是中国人口增长仍从1700年的1.75亿达到了1900年的5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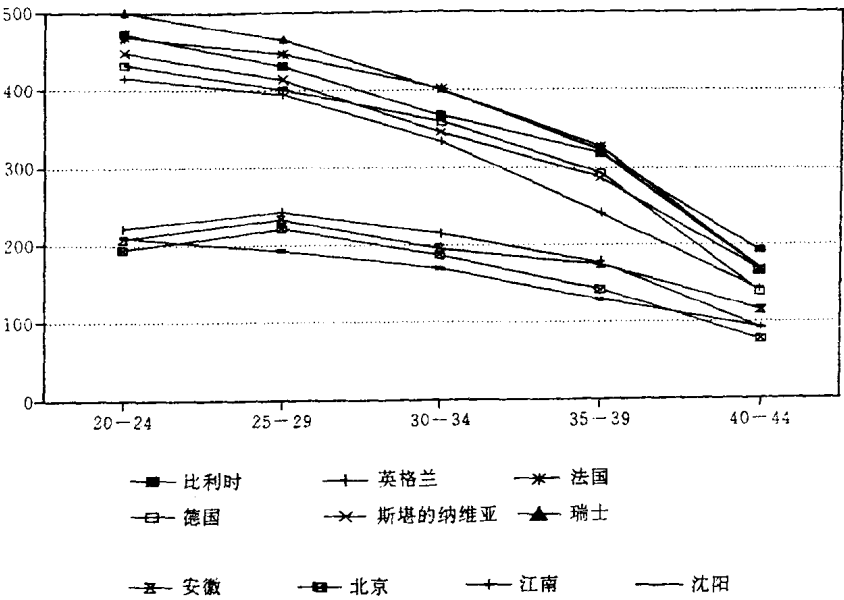


图2 各年龄组女性生育力的比较模式(1550—1850)

更重要的是,即便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生育孩子的数目也不多。这是因为这种婚姻制度虽允许一夫多妻,并不鼓励婚后多产多育,更不用说是杂乱交媾。在对1751年至1849年间约四千例的皇族一夫一妻制婚姻和一夫多妻制婚姻进行比较后显示:后者比前者仅多生育一个孩子(5.7:

4. 5)。⑤即使是在一夫多妻制家庭，男主人也不一定与几个妻子同时保持性关系，而似乎倾向于“喜新厌旧”。而对皇族一夫多妻制家庭的研究也的确证实了此一观点(Lee, Wang, 和 Campbell 1995年)。故在典型中国家庭中，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要挂“红灯笼”。清朝的中国男子比起欧洲男子来，可说是“多妻而不多子”。

如此低的生育率是繁复多层次节制下的产物，皇族人口便是最好的例证：因为皇族宗谱总是将其成员的生死日期精确地记录在案，男女一视同仁，这与中国其他同类有关资料相比，数据是最全的。⑥由此，我们可依照严格的生育行为标准来推算皇族成员的育龄、生育间隔时间以及准确的新生儿、婴儿和孩童的死亡率。有关其他人口的数据只是粗略的估计，因为其来源通常是不完整的男性人口记录(Liu Ts'ui-jung 1992年；Telford 1992年 a)。当然，就全中国范围而言，皇族人口的生育率并不具代表性的(见图3)。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结构变迁下的经济压力迫使越来越多皇族成员使用控制手段来降低生育率。但大致上，皇族降低生育率的目的却在中国有其代表的意义。⑦因此对于皇族人口的研究使我们可以认识另一种限制家庭规模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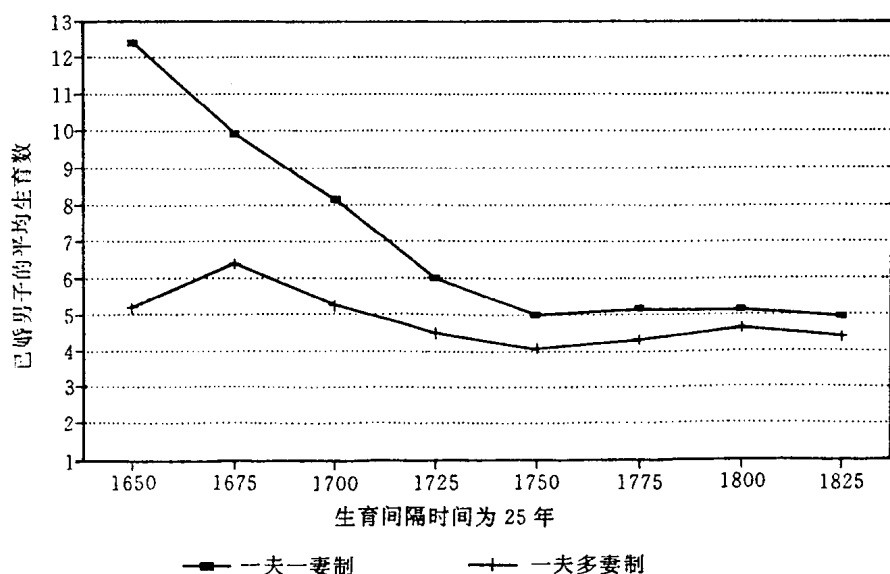


图3 皇族宗室男性生育率(1650—1850)

当然，被马尔萨斯称为“预防性制衡”的婚姻是节制生育的第一种手段。实际上，它也是欧洲夫妇们限制家庭规模的唯一方法。Wrigley 和 Schofield 已阐述过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婚龄和成婚率是如何受到社会和经济条件所制约(Wrigley、Schofield 1981/1989年)。我们可以看到皇族成员中也有相似的模式。在18、19世纪，当宫廷减少俸禄时，图4显示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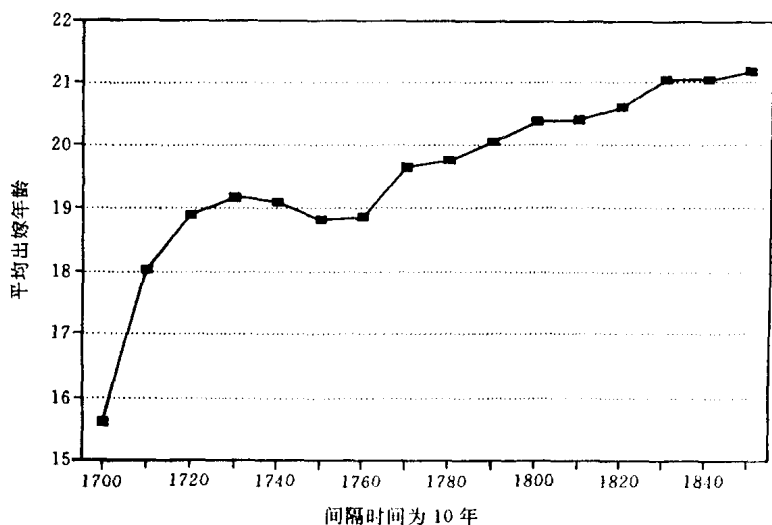


图4 皇族宗室女子出嫁年龄(1640—1850)

当时女性婚龄,从十几岁延至20岁以后。图5中独身女性的数量亦随之上升。18世纪初,半数以上的18岁女子都已成婚;到了19世纪初,却有三分之二的18岁姑娘仍待字闺中,这便给生育率带来显著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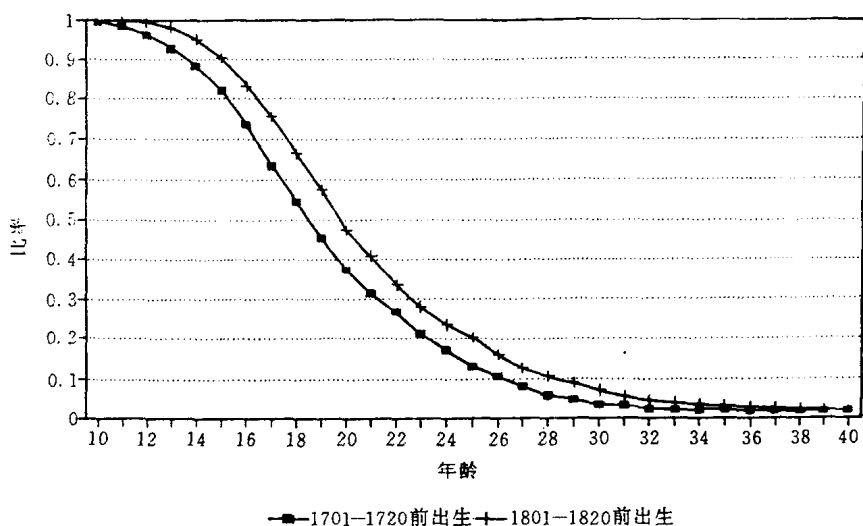


图5 皇族宗室女性婚龄后移不同年龄组比率

此外,皇族男子不仅结婚较晚,一夫多妻的情形也较为减少。这种一夫多妻的选择始终是欧洲男子所未有。图6概括了1650年到1900年间皇族中一夫多妻婚姻例子及所娶妻子数目都稳步地下降。一夫多妻婚姻从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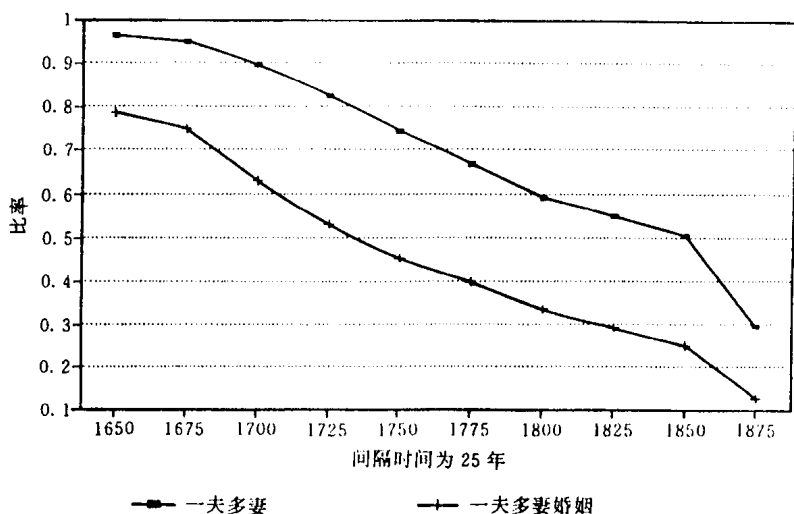


图6 多妻制的衰落(1650—1900)

世纪末期的百分之七十五比例降至19世纪的百分之十。一夫多妻家庭中妻子的数量自然也减少了。因此,清初时皇族已婚男子每人拥有四个妻子,至清末时只有一个多一点的。

再者,中国的夫妇显然在婚后犹能控制彼此间的情欲,这在欧洲几乎是不可行的。^⑧他们避免早育,并延长每一胎的生育间隔时间。图7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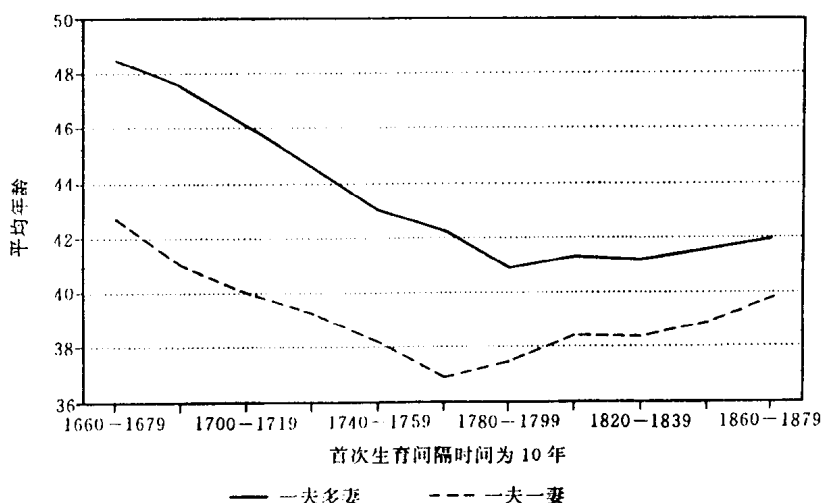


图7 皇族宗室男子最后一次生育年龄(1660—1880)

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末,皇族一夫多妻家庭中丈夫最后一次生育的平均年龄降低了7岁(从48岁到41岁);一夫一妻家庭中丈夫最后一次生育的平均年龄也从42岁到37岁,降低了5岁。同时,生育间隔由类似欧洲情形的两年多,增加到4年甚至5年。图8,以每20年为一个阶段,将1680年到1879年间皇族宗室一夫一妻制家庭生育间隔增加与其他情形进行对比。由于情欲的减退或自制力的加强,最后一次生育的间隔时间显得特别长。无论如何我们都能看出中国两种节制生育的手段:婚前及其婚后的节育措施。在欧洲则只有一种婚前节育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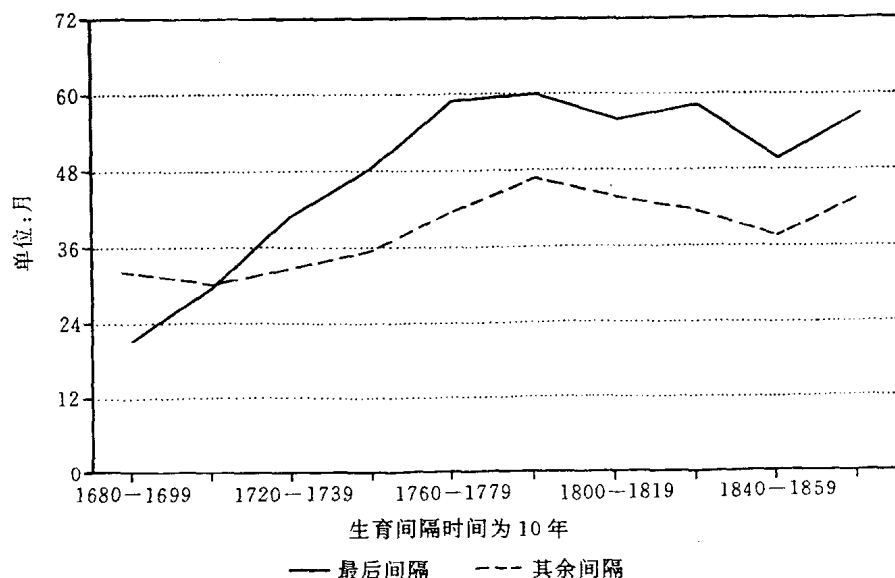


图8 皇族宗室一夫一妻夫妇生育间隔的延长(1680—1879)

同时,我们可以指出两种中国式的死亡率。即马尔萨斯(Malthus)所谓的“正面性制衡”。夫妇双方借此来决定家庭的规模和构成。一方面,有些夫妇以溺婴方式来控制后代的数量和性别(Lee, Campbell 及 Tan 1989年和1992年)。另一方面,他们又寻求最新的保健法来照料那些存活下来的孩子(Hsiung 1991年)。总而言之,死亡率并不完全是清代人口系统的外因。夫妇有按其意愿调节死亡率的能力。

虽然我们难以确知溺婴的具体数目。在辽宁农村的一份研究中, Campbell 和我估计约有四分之一的女婴成为选择性溺婴下的牺牲品(Lee 和 Campbell 近将出版)。溺婴的数量受职业、家庭地位和粮价波动等经济因素所制约。一般而言,地位愈高,孩子愈多,其中男孩的比重也愈高;而地位愈低,孩子愈少,其中女孩的比重则较高。大家庭户口注册中,家长所育男子的数量为其属下所育数量的两倍;但女孩却约略只有其属